

DOI: 10.13957/j.cnki.tcx.2024.03.023

引文格式:

万剑, 张毅威, 张杰, 等. 形色之美与文化基因: 古代越窑青瓷茶具对日影响与当代发展策略[J]. 陶瓷学报, 2024, 45(3): 621-630.

WAN Jian, ZHANG Yiwei, ZHANG Jie, et al. The aesthetics of form and color intertwined with cultural genes: The impact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ncient Yue Kiln Celadon tea ware in Japan [J]. Journal of Ceramics, 2024, 45(3): 621-630.

形色之美与文化基因：古代越窑青瓷茶具对日影响与当代发展策略

万剑¹, 张毅威², 张杰³, 王娟³

(1.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丝路艺术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800; 2. 江西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3.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摘要: 中国瓷器艺术是世界文化之瑰宝, 是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间传播与融合的典型范例, 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之一。越窑青瓷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瓷器, 历来以“形制简约”“色泽青雅”“纹样吉祥”的艺术特征而备受赞誉, 并早在两汉时期即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为中华民族传统陶瓷文化与美学精神的推广、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其中, 越窑青瓷茶具对日本陶(瓷)制茶具文化的影响尤深。伴随着越窑青瓷的大量传入, 日本的制陶(瓷)工艺不仅获得革命性提升, 更在器形、釉彩、纹样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造物美学的影响与熏陶, 推动了日本陶瓷文化的长足发展。这一文化交流、共融的史实案例对当代越窑青瓷的文化遗产与创新发

关键词: 越窑青瓷; 茶器; 日本; 艺术交流; 造物文化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4)03-0621-10

The Aesthetics of Form and Color Intertwined with Cultural Genes: The Impact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ncient Yue Kiln Celadon Tea Ware in Japan

WAN Jian¹, ZHANG Yiwei², ZHANG Jie³, WANG Juan³

(1. Silk Road Art Research Center,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5800, Zhejiang,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Jiangxi, China; 3.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ingbo 315175,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eramic art is a gem of world culture and a typical case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mo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narrating the Chinese story. As the earliest porcelain in the world, Yue Kiln Celadon has long been praised for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ified form", "elegant cyan color" and "auspicious patterns".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craftsmanship and aesthetics since its global introduction via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mong these, the influence of Yue Kiln Celadon tea wa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eramic tea ware culture is particularly profound. With the substantial introduction of Yue Kiln Celadon, ceramic craftsmanship in Japan not only underwent a revolutionary enhancement, but also was deeply influenced and nurtured by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form, glaze color and patter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ignificant

收稿日期: 2023-12-21。

修订日期: 2024-03-06。

Received date: 2023-12-21.

Revised date: 2024-03-06.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22NDJC317YBM)。

Correspondent author: WAN Jian (1978-), Female, Master, Professor.

E-mail: wanjian8825@163.com

通信联系人: 万剑(1978-), 女, 硕士, 教授。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eramic culture. This historical cas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provides profound insights for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Yue Kiln Celadon.

Key words: Yue Kiln Celadon; tea ware; Japan; artistic exchange; culture of craftsmanship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1]中国瓷器艺术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历经隋唐、五代至北宋，中国对日陶瓷贸易兴盛，越窑青瓷茶具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引领日本陶瓷茶具事业在技术、艺术、文化等方面的长足发展，促进了中日之间“因物质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世界文明注入了中国文化基因和民族智慧，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大国风范。

1 古代越窑青瓷的民族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浙东地区为全国瓷器的发源地^[2]，一千八百多年前，我国最早的成熟瓷器——越窑青瓷就在东汉的浙东越窑里烧制成功^[3]，这是我国陶瓷生产史中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4]。越窑青瓷是中华民族原生性、主体性器物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体现民族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典型代表。“文化基因，就是指深深潜藏在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5]。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越窑青瓷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的独特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之造物基因。博大精深的越窑青瓷文化，集聚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凝聚着团结协作、勇往直前的团队精神，蕴含着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对越窑青瓷艺术基因密码解析可知，其“形之尚简”“色之尚青”“纹之尚吉”的形制创造与审美表达，不仅对世界早期瓷器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更是当代中华器物文化于世界发展的本质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1.1 形之尚简

“简约”是中华民族器物文化的审美取向之一。以中国哲学中的“大道至简”和美学范畴中

的“简约”“简练”“洗练”等概念来形容越窑青瓷形制的“简约风格”可谓恰如其分。自东汉至北宋的一千多年间，越窑青瓷形制始终追求“简约”之美。简约，意味着舍弃多余累赘之装饰，达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效果。

越窑青瓷形制古朴端庄，形式表达简约凝练，追求器物造型的统一与平衡。因唐宋饮茶之风盛行，越窑茶具种类日益丰富，主要有茶碗、茶盏、茶杯、茶壶、茶碾、茶托、茶鍏、茶釜、茶则、茶托子、茶磨、茶瓶、茶罐、茶盒等。碗，亦可称之为“盃”“椀”，在古代是饮茶之器。茶碗、茶盏、茶杯又可统称为茶瓿，主要功能是用来喝茶。“碗，越州上……越瓷青而茶色绿”，这是陆羽在《茶经》中对越窑青瓷茶碗的高度评价。唐代茶碗的造型有海棠式碗、荷叶形碗、葵瓣口碗、玉璧底碗等，到了宋代，茶碗逐渐演化为茶盏。茶瓶、茶罐、茶盒是茶叶的储藏器。茶壶(执壶)是煮茶之器。茶托为茶垫。茶碾是轮式茶碾，两边有扶手，中间有碾轮，下面是碾槽。越窑青瓷以古朴端庄的器型、温润似玉的釉质、简朴无华的装饰，构成了以“简”为核心的审美取向，成为世界早期陶瓷模仿之范式。

越窑青瓷的简约风格，是器物的本真，是朴素的本真。这种简约，摒弃了眼花缭乱的视觉语言，留下了古淡天真的真情表达，给人们带来更多心灵上的宁静与平和。实用与美观的越窑青瓷，充满了“见素抱朴”的含蓄与中和之美。唐人对越窑青瓷茶具爱不释手、青睐有加，多少文人墨客为此留下诗词墨宝：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中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瓿》中的“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瓿》中的“岂如珪璧姿，又有烟岚色”；均是对越窑茶具的高度赞美。越窑青瓷的“尚简”形制，以“天人合一”为思想基础，集儒、释、道三大家之精华，体现古人“虚静”的生活态度，其雅逸、超然的美学内涵，令人们在使用越瓷、欣赏越瓷的同时，也接受了心灵的净化和洗礼。

1.2 色之尚青

古代先贤们深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

哲学意蕴，善用色彩来“抒情”“言志”。从字义表面看，青的范畴较大。上古之时，我国的“青”字就已兼表蓝、绿、黑三色，范畴可包含“苍”“绿”“葱”“翠”“缥”“緜”等表示颜色的词。古瓷中的“青”特指“淡绿”“黄绿”“灰绿”等系列色彩。在清代刘体仁《爱日堂抄》中有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6]《茶经·四之器》认为青则益茶，表明了陆羽对青瓷茶具的推崇^[7]。又如，东汉潘岳《笙赋》有“缥瓷”、汉人邹阳《酒赋》有“绿瓷”等，均是关于古瓷“尚青”的言论。

中华民族瓷器色彩文化观念自古尚青，认为青是高雅之色。青为五行之色，“青、赤、黄、白、黑”中，青字代指东方，是木之色，与四时相联系。青字从生，有生命、生长、生生不息之义，也是春季的象征。《说文解字·卷五下》：“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凡青之属皆从青。”^[8]《释言·释采帛》：“青，生也，象物生时色。”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崇尚“自然”成为刻在中华儿女基因深处的审美追求。当匠人们用匣钵烧制越窑青瓷“秘色瓷”获得成功后，这种“青色”似乎成为了当时唐王朝最高级别的宫廷用瓷，这一点可以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瓷中得到验证。秘色瓷的“秘”，其中一种重要解释是釉色，就如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9]描述一般。从人成长的自然环境来说，人眼更加适应“青绿色”，而根据历代越窑青瓷釉色分光反射率实验显示，其结果与人眼对色光的敏感光谱相同^[10]。这与德国眼科专家H·Magnus(1988)的观点可以一一对应，他认为人们若碰到光谱上相邻的颜色，其语言表达会经常混淆，例如“蓝”与“绿”^[11]。越窑青瓷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在追求这样一种接近完美的“青”色。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翡色”^[12]，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瓿》中有“千峰翠色”“烟岚色”，徐夔《贡余秘色茶盏》中有“翠”“青”“冰”“绿”等字词描述，均是对越窑青瓷色彩的赞美，道出了越窑青瓷茶具釉质“似玉”“类冰”的温润感。

这种“青”色不仅指越窑青瓷本色，更是指煮茶、煎茶、饮茶时越窑青瓷衬托茶水、茶汤的愈加“翠”“青”“绿”“烟”“寒”“冰”之色。“器

为茶之父”，唐代众多文人对越窑茶具评价极高。徐夔《尚书惠蜡面茶》：“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施肩吾《蜀茗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郑谷《题兴善寺》：“茶助越瓯深。”许浑《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散香薪簟滑，沉水越瓶寒。”韩偓《横塘》：“越瓯犀液发茶香。”这些古诗词从瓷色、茶色的角度出发，极致赞叹了越窑青瓷的瓷色之美。当瓷色与茶色完美融合之后，呈现出的“青”色更是达到了古代造物色彩的巅峰，印证了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茶滋于水，水藉乎器”之言。这些评价证明了当时越窑青瓷茶具尤其是秘色瓷“青”色的成就之高、声誉之广。

1.3 纹之尚吉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讲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吉祥，《说文解字》释义“吉，善也。祥，福也，云善。”《庄子·人间世》言“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中庸》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吉祥也。”唐代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纹，指纹样。纹样是装饰花纹的总称，又称花纹、花样，也泛指纹饰或图案^[13]。越窑青瓷茶具之纹尚“吉”，与其他中国传统纹样一样，以中华器物为载体，反映不同时期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期望。这种“吉”是极具生命力的东方特色艺术，这种吉祥纹样是最具中华民族艺术人文内涵的世俗仪表^[14]。

越窑青瓷装饰纹样通过拍花、印花、点彩、刻花、划花、堆贴、雕镂等重要工艺技法，在莹润如玉的茶具外表或内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越窑青瓷茶具装饰纹样可以分为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纹、几何纹等。典型的动物纹样有蛙、鸟、蝶、鱼、龟、马、羊、熊、貔貅等；植物纹样有牡丹纹、莲瓣纹、叶片纹、瓜果纹等；自然纹有太阳纹、云纹、水纹等；几何纹以镂空的圆、方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为主，也有模印的网纹、编织纹等。其中，花卉纹与动物纹的组合颇为常见，可以组成云鹤飞翔、翠鸟展翅、蝴蝶恋花、龟憩荷下等各种富有生活气息的图形^[15]，寓意着美好的祝福和虔诚的祈福。例如：出土于浙江黄岩的“咸平元年”镂空卷叶纹香薰，盖上镂空卷草纹，底座为莲瓣刻划纹，寓意着福气绵延。出土于浙江宁波的北宋牡丹鹦鹉纹盖盒顶部装饰着旋转对称的鹦鹉穿梭在牡丹花丛中，显得生机勃勃。出土于浙江临安的五代褐彩云纹罍，用褐彩在颈部、腹部描绘连片卷云纹，在肩部描

绘二方连续莲瓣纹，有祈福长寿如意之意。这些纹样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精神，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特征和文化面貌，体现了继原始瓷出现以来中华民族在审美观念上的创新发展。越窑青瓷纹样蕴涵着浙东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先民们所积淀的理想愿望、审美情趣、艺术魅力等融合在一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特色。

2 古代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茶具的影响

中日两国，自古便有交流。中国史籍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房乔《晋书》、魏徵《隋书》等均有对中日两国人民交往、交流的记录。随着两国官方、民间交往的日益深入，越窑青瓷漂洋过海不断传入日本。中国传统艺术的优秀基因——越窑青瓷的形制、色彩、纹样等文化符号便开始了传播历程，其所传播的优秀制瓷(陶)技艺、民俗文化、装饰风格对日本陶制茶具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7世纪开始，中日文化交流频繁。公元630年~895年，日本共派出十九次遣唐使。这些遣唐使、留学生(僧)来华学习中国的制度、科技、文化等，学成之后返回日本，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9世纪开始，日本废止遣唐使，大批商人开始从事贸易活动，大量中国越窑青瓷出口到日本。在鸿胪馆遗址中出土了无以计数的越窑青瓷、邢窑定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等^[16]，这种瓷器的组合也被称为“初期贸易组合”。日本学者龟井明德在《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之方法论》中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止，日本考古挖掘的陶瓷遗址已达八千余处，其中出土的多以外来的中国陶瓷器遗存为主^[17]。越窑青瓷的发掘地主要集中在日本中部、西部，直至冲绳。在最接近中国大陆的九州地区(尤其是设有外交机构的福冈附近的大宰府和鸿胪馆等)、当时日本首都平安京(京都)和奈良的平城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越窑青瓷遗存。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贸易史の研究》中有这样的论述：以贸易陶瓷来说，美观、耐用的中国陶瓷给所及之地的日常生活及审美意识带来了深刻影响^[16]。日本学者矢部良明在《中国陶瓷对日本陶瓷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认为“对日本陶瓷业影响最著者无疑是越窑青瓷。”^[18]

在越窑青瓷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下，日本陶业一直在贸易陶瓷的刺激下竭力生产貌似“唐物”的仿制品^[19]。9世纪至10世纪，日本京都和京都周边的陶窑以来自中国的越窑青瓷为模仿对象，开始用传统的绿釉陶制作技术烧制大量的仿越窑陶器，如在京都附近的播枝窑、西贺茂窑、筱窑、大原野窑、石作窑等。山口县周防铸钱司窑、滋贺县的山神窑、十禅谷窑和日野窑，还有爱知县西部一带的一些灰釉陶窑等，均烧制仿越窑的日本茶具或其他功能的器物^[20]。可以说，越窑青瓷文化的输入，为日本制陶业的发展和再生产呈现了新的文化内容。

2.1 “尚简”形制对日本茶具的影响

《周易·系辞上》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越窑青瓷茶具的造型承载着中华陶瓷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表达。跨海来到日本的越窑青瓷中最主要产品有碗、盒、水注、唾壶、灯盏、罐等，这些器物与茶事均直接相关。碗的种类丰富，在日本出土的越窑青瓷碗有玉璧底碗、葵瓣碗、五花口形碗等，做工精致，造型优美。福冈市柏原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中有碗、盒子、水注、香炉、壶等，其中碗的数量最多^[21]。崇福寺出土蛇目高台的碗，广隆寺出土皿形器，宇治市木幡净妙寺遗址出土水注，仁和寺堂遗址出土晚唐越窑青瓷盒子，九州西北部、博多湾沿岸博多遗迹群出土灯具、盅、香炉、水具等。^[20]这些在日本考古发掘出的越窑青瓷，与《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的论述可以一一对应：散布在京都附近的绿釉陶窑和爱知县西部一带的灰釉陶窑大多以越窑青瓷为模仿对象，蛇目高台的碗、圆脚的腰折碗、水注、盒子、香炉、唾壶和四足壶也无一不是仿自越州窑的造型^[18]。

形制乃为实用。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中言及“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盛”虽然是个动词，但实际显示出日本皇室注重越窑青瓷的实用功能。在醍醐天皇下令编纂的《延喜式》中提到了对中国古代饮茶习俗的模仿。日本宫廷学习唐朝的茶会模式，根据饮茶的不同形式搭配不同的茶具，例如行茶、独啜或者根据茶会规模的大小，专门配以大小不同的茶碗。《延喜式》律令条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尾张国瓷器……茶小碗(径各六寸)”“长门国瓷器……茶碗二十口(径各五寸)……花形盐杯十口(径各三寸)”。因日本当时无法制作瓷器，所以这里所说的“瓷器”实际上是指“陶器”。这段话明确

提到了尾张生产茶碗、长门生产茶碗、煮茶时用贮盐器——花形盐杯，还有盛水器——瓶(水注)，这说明 9 世纪之后，日本仿越窑茶具烧制是在专门的绿釉陶窑中进行规模化生产。根据《延喜式》的记载，尾张国和长门国生产的绿釉陶茶器还会贡奉宫中御用，例如瓶(见图 1)^[22]、四足壶、碗等。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平安时代的绿釉四足壶(见图 2)是目前发现的最为精美的绿釉陶代表作之一，这是平安时代爱知县猿投窑模仿越窑青瓷四足壶的样式烧制而成。其与越窑青瓷四足壶相比，体形略大，腹部增加了三道凸弦纹。公元 10 世纪，爱知县西部猿投山麓的猿投窑开始烧制绿釉陶器。十一世纪，扩展到伊势、三河、远江、骏马地区。于十二世纪衰落。猿投窑及其下属窑均有绿釉陶器的烧制，这些陶器的形制风格与釉彩装饰，皆受到中国越窑青瓷的影响。例如：收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平安时代绿釉骨壶(见图 3)，造型源于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在越窑青瓷形制中常有出现。将这些茶器与中国同时期越窑青瓷茶具(见图 4、图 5)对比，可谓同出一源。日本陶瓷茶具形制风格的再发展，受中国造物文化熏陶与影响深远，是中国越窑青瓷民族文化基因发挥对外传播作用的重要例证。



图 1 日本平安时代猿投窑灰釉带把小瓶

Fig. 1 Grey glaze small vase with handle in the kiln of Sanage-yama during Japanese Heian period



图 2 日本平安时代绿釉四足壶(日本九州博物馆)

Fig. 2 Green-glazed four-footed pot, Japan (Kyushu National Museum, Japan)



图 3 日本平安时代绿釉骨壶(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Fig. 3 Lotus-leaf-shaped green glazed pottery, Heian period, Japan (Kyoto Culture Museum)



图 4 唐越窑青瓷执壶(故宫博物院)

Fig. 4 Celadon holding pot, Yue ware, Tang Dynasty (The Palace Museum)



图 5 五代越窑青釉瓜棱罐(故宫博物院)

Fig. 5 Green glazed melon jar, Yue ware, Five Dynasties (The Palace Museum)

2.2 “尚青”色彩对日本茶具的影响

在早期瓷器的烧制过程中，釉色的控制一直是技术的难点。唐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的“青”色是当时世界上色釉瓷烧制技术的顶峰，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青瓷八棱净水瓶、碗、盘、碟等是最好的证明。“秘色”一词含义颇多，其中就有“碧色”之义^[23]。越窑瓷器外表之色有青绿、青灰、青黄等，当这些“青色”茶具展现在日本皇室和贵族面前时，便迅速满足了他们对饮茶器具之审美要求。唐代陆龟蒙的“千峰翠色”、五代徐夔的“明月染春水”“薄

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佳句均是对越窑青瓷色彩的高度评价。古代日本文献资料中亦有对越窑青瓷色彩的专门描写。在日本史料中，“秘色”或“越坑”为描述越窑青瓷的语言。公元951年的《史部王记》、公元952前后的《宇津保物语》、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等皆有对使用越窑青瓷的案例描写，文中均出现了“秘色”字样。室町时代的《花鸟余情》对《宇津保物语》中的秘色杯注释为“青色茶碗类”^[21]。“唐人书简”（最初附于《高野杂笔录》下卷末尾）有“越坑”“越坑子”“青瓶子”等字样，“越坑子”可以认为是越窑青瓷茶碗。日本明治时期，石川鸿斋赞美越窑青瓷：“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余姚沈君藏一瓶，釉色莹澈凝貌青。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贻我何厚情”^[24]。这些史料均描述、赞叹了越窑青瓷的色彩。日本的陶器在不断地模仿这种色彩，以期获得类似越窑青瓷“秘色”效果。

越窑青瓷作为进口陶瓷之上品，多为日本上层贵族及僧侣所使用，但若满足广大百姓的需求，需要在本土进行烧制。显然，越州窑青瓷给日本9世纪~10世纪的制陶业以极大的刺激。绿釉陶……由于其色彩近似青瓷而极易转用，爱知县的猿投窑还烧制出与青瓷同样原理的灰釉。^[18]茶器以青瓷为上，因此，日本制陶业开始大量烧制仿青色的陶器，用来代替越窑青瓷茶具。平安时期，日本陶窑开始摸索仿烧越窑青瓷，并持续烧制绿釉饮茶器具。奈良三彩有烧制色釉陶器的技术基础，且其中绿釉色泽与越窑青瓷色泽较为接近，在此情况下，平安一朝的陶工们进行对越窑绿釉陶的仿制工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平安绿釉器应运而生，这既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选择，也是技术基础决定的。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平安绿釉器遗物的出土地点多为律令机构的官衙遗址和寺院，这与越州窑青瓷出土地基本一致。烧制绿釉器的陶窑遗址主要在日本山城国、近江、尾张、美浓等地区，主要集中于京都附近的畿内地区、爱知县西部到岐阜南部的尾张和美浓地区、滋贺县近江地区等^[16]。出土于平安京左京八条三坊古迹（七条边）的绿釉陶器现收藏于京都文化博物馆，其色彩与越窑青瓷非常接近，深色的浓绿、浅色的黄绿，形成了绿色的不同色系。通过仿制越窑青瓷，从而解决了日本社会不同阶层对“青色”陶瓷茶具需求的问题。

2.3 “尚吉”纹样对日本茶具的影响

纹样作为一种装饰符号，本身就代表着特定的中华陶瓷文化，这是一种与一定时代、一定社

会阶层、一定地域、一定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器物文化^[25]。当越窑青瓷来到日本之后，其装饰纹样也随之影响着日本陶瓷茶具的装饰。从造型到色彩再到纹样，“仿造宁波越窑青瓷，在平安时代已经相当普遍。”^[20]在日本畿内、尾张、美浓和近江等地区的绿釉陶窑遗址中，出土的碗、皿、香炉、唾壶、水注等，“以模仿中国陶瓷为主命”“多见类似越州窑青瓷的阴刻花纹、蝶纹、飞云纹、莲瓣纹、透雕唐草纹等。”^[16]经过对比，这些典型装饰纹样与越窑青瓷非常相似。例如：千叶县市原市荒久遗迹出土的灰釉瑞云纹净瓶（见图6）^[24]，被认为是猿投窑十世纪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该灰釉瑞云纹净瓶，形制秀美，颈细长，颈上部有“隔”，长弧腹，圈足外撇。肩部有一呈钵状的水注口。在肩部、腹部有细线阴刻的宝相花、瑞云纹等，线条流畅、纹样生动。又如：将日本平安京右京、二条、二坊出土碗盘中的花瓣形态（见图7）^[16]与越窑青瓷考古学家林士民先生所绘的越窑青瓷装饰纹样（见图8）^[26]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其与越窑青瓷的纹样母题、装饰手法、骨骼形式非常相像，无疑是模仿越窑青瓷制作而成的。再如：以大原野为中心的洛西窑址群中，石作窑1、2号窑址出土了9世纪后半期有阴刻花纹、轮花口沿的碗、皿及香炉、唾壶等。日本古代学协会整理了平安时代的绿釉窑石作窑古陶器（见图9），在这些陶器上有阴刻牡丹花叶纹，形态饱满，线条圆润，与同时期越窑装饰纹样风格几乎是一致的，体现了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装饰艺术的影响。



图6 日本十世纪猿投窑灰釉瑞云纹净瓶
Fig. 6 Gray-glazed bottle with cloud pattern, 10th-century Sanage Kiln



图 7 日本平安京右京、二条、二坊出土的花瓣纹碗盘
Fig. 7 Petal patterned bowls and plates unearthed from Youjing, Ertiao, and Erfang in Ping'an, Japan



图 8 唐越窑青瓷手绘纹样(林士民绘)
Fig. 8 Tang Yue Kiln celadon hand-painted patterns of Yue Kiln in Tang Dynasty (painted by Lin Shimin)

3 越窑青瓷茶具的当代发展策略

越窑青瓷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使者。三上次男曾说：“长久以来，日本的陶瓷器一直是单方面地接受中国陶瓷器的影响和刺激而向前发展。”^[27]而中岛健藏则表示：“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28]作为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越窑青瓷向世界传播的形制、色彩、纹样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成为了他国早期陶瓷事业发展的模仿对象，促进了世界各国、各地区陶瓷艺术的交流与进步。当下，应通过对古代越窑青瓷茶具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度解析，思考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致力于中华优秀陶瓷文化的全球传播，推动传统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融合和多元化发展。

在历史上，越窑青瓷曾经是外销瓷器大户，可谓是早期世界贸易产品中的佼佼者。但自北宋元祐年间逐渐衰落之后，古代越窑青瓷大批量的海外贸易也随之终止。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当地



图 9 平安时代石作窑古迹出土的阴刻文、刻字陶器(日本古代学协会)
Fig. 9 Inscribed pottery unearthed from stone kilns in the Heian period (Paleological Association of Japan)

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瓷艺匠人呕心沥血通过数十年时间恢复了千年越窑的烧制技艺。2005年，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5月，其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传承人的坚持不懈努力下，越窑青瓷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生产性保护道路。但是，与江西景德镇陶瓷、浙江龙泉青瓷等品牌相比，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例如：提升越窑青瓷茶具在国内外陶瓷茶具市场中的整体品牌形象，增强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创新经营模式、营销方式，主动开展世界性的陶瓷茶具文化交流、展示活动等，这些均需要政府、传承基地、传承人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3.1 挖掘文化基因，加强技术创新

越窑青瓷作为一种优秀的器物文化发展至今，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在不断地传承与发展，这是悠久的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中正固本的典型案例之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自然界到中外文化概莫能外。充分继承并精研越窑青瓷的内在文化基因，从形制、色彩、纹样等多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挖掘其中的造物奥秘，继而重新演绎、拓展这种文化。深入剖析越窑青瓷文化基因中的各种要素，将传统元素和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特色鲜明的新型陶瓷茶具，是越窑青瓷立足当代、谋求突破的路径之一。世界精致瓷器代表英国威基伍德(Wedgwood)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受到中国陶瓷文化影响后，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断自我创新，逐渐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全球知名品牌。这是威基伍德瓷业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技术创新取得的成果。

当下，景德镇陶瓷创新品种非常丰富，例如：法蓝瓷、红叶、艺林堂粉彩、春风祥玉、自牧堂等通过技术改造和品牌提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德镇陶瓷茶具品牌。这是值得越窑青瓷茶具产业学习的重要案例。“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9]传承创新，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文化内涵进行补充、拓展，深刻剖析文化基因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继而运用最新技术进行时代化的设计创新。目前，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宁波明州越窑青瓷有限公司、浙江中立越窑秘色瓷研究所等传承基地正在不断探寻越窑青瓷茶具的

创新发展路径。创新越窑青瓷茶具设计应在充分融入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兼顾中国文化的时代性，借鉴当下世界流行的时尚性元素，开发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青瓷茶具文化产品，这才是真正有效传承和发展关键。

3.2 增强品牌意识，提升文化影响

目前，越窑青瓷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国家级非遗“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省级非遗“越窑青瓷瓯乐”“越窑青瓷”、市级非遗“越窑·秘色瓷烧制技艺”等，进一步推进理念创新、技术创新、设计创新是品牌发展的重要工作。越窑青瓷主创茶具产品有盘、杯、壶、瓶、格等。以慈溪越窑青瓷有限公司为例，其创新推出“四时青岚”系列、“锦绣东方”系列、“弦·月”系列等，这是越窑青瓷民族品牌创新发展的代表。首先，要加强品牌保护。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越窑青瓷品牌保护，注册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等，对越窑青瓷茶具原创性产品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专业化保护。其次，要打造品牌形象。对内挖掘文化价值，提升产品质量，对外讲好产品故事，强化品牌形象。讲好与越窑青瓷茶具相关的感人故事、传奇经历，宣传越窑青瓷的文化价值和品牌特色，提高公众对品牌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和保护意识。再者，要整合品牌资源，通过跨界合作、资源整合，拓展越窑青瓷品牌的影响力，政府牵头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形成越窑青瓷产业园区，进行市场化运作，激发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企业(基地)及越窑青瓷相关的文化企业、贸易公司等形成联盟，促进浙江越窑青瓷民族品牌不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对于越窑青瓷来说，不断增强越窑青瓷民族品牌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陶瓷民族品牌，是当下新时代推进传统文化自信自强的典型案例。

3.3 创新营销方式，拓展跨境电商

“酒好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历史中，越窑青瓷的高光时刻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随着世界全球化贸易的不断发展，越窑青瓷应主动走出去，积极拓展各类陶瓷业务。如今，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迅速崛起，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陶瓷销售的不二选择，跨境电商可以成为越窑青瓷茶具产品进入全球化贸易的重要途径。例如：江西景德镇正在全力打造国际陶瓷文

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建立了全球陶瓷行业智能网，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赋能陶瓷企业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日用陶瓷出口数量为497万吨，出口金额为2249599.2万美元；2023年1~9月中国日用陶瓷出口数量为341万吨，出口金额为1218477.2万美元。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中，越窑青瓷想要获得更多的份额，应不断拓展营销方式，尤其应重视跨境电商，这是一种与全世界对话的更优方式。目前，越窑青瓷跨境电商平台可以选择三种模式：自建跨境电商平台模式、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模式和外贸电商代运营服务商模式。根据越窑青瓷茶具的产品特性，结合三种模式的运作要求，以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模式为主要方式，其他两种为附加方式更为合适。越窑青瓷茶具产品的出口商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可以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例如：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速卖通、海外版拼多多 Temu、Shein、Amazon、TikTok、Shopify、Made-in-China 等相对成熟稳定的平台，进行跨境电商销售，扩大产品销售市场，提升国际知名度。

3.4 扩大国际视野，加强文化交流

越窑青瓷是古代中国影响世界器物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如今，习近平总书记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议题，围绕“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命题展开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谋篇布局和系统规划^[30]，这为越窑青瓷的当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31]。越窑青瓷的民族文化基因，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传播力的符号。从2013年至今，越窑青瓷先后在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等12个国家演出，让世界人民更进一步地了解越窑青瓷，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中，越窑青瓷茶具“青影”“欢聚”“青玉杯”“越瓷牡丹瓶”和“花开富贵”五套作品入选杭州亚运会特许商品名录，这是越窑青瓷登上国际舞台的好机会。通过与国际接轨，增强人工智能的介入，增强国际数字化传播内容的建设，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走出去，打造越窑青瓷的国际学术品牌、非遗艺术节、国际图书出版等人文品牌项目；引进来，搭建中华饮茶文化国际化交流平台，打造青瓷茶具国际品牌交流活动；谋发展，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人工

智能来创新开发中国优秀陶瓷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4 结 语

中国古代越窑青瓷东渡日本之后，对日本的制陶(瓷)事业尤其是茶器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器物文化自身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走向世界的辉煌业绩。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不竭的生命力，而其生命力背后所含蓄的文化基因则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得以生存、延续，继而不断发展的内蕴源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在历经风雨、面对现代化挑战洗礼之后，仍然实现凤凰涅槃式新生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2] 林士民. 青瓷与越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3] 中国硅酸盐学会. 中国陶瓷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4] 徐定宝. 越窑青瓷文化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朱汉民. 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J]. 中国哲学史, 2022(4): 5-11.
ZHU H M.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22(4): 5-11.
- [6] 熊廖. 中国古陶瓷集成: 注释本[M].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7] 陆羽. 茶经[M]. 于良子, 注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 [8]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魏建钢. 越窑制瓷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0] 杨焱锋, 黄文杰. 宁波青瓷文化[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9.
- [11] 赵晓驰. 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青”类词[J]. 古汉语研究, 2012(3): 73-79.
ZHAO X C.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2012(3): 73-79.
- [12] 孙希国.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 [13] 田自秉, 吴淑生, 田青. 中国纹样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4] 张道一. 吉祥文化论[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叶宏明, 叶国珍, 叶培华, 等. 浙江青瓷文化研究[J]. 陶瓷学报, 2004, 25(2): 85-92.
YE H M, YE G Z, YE P H, et al. Journal of Ceramics, 2004, 25(2): 85-92.
- [16] 袁岚. 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 中

-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7] 龟井明德. 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之方法论[C]//中国古代贸易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台湾历史博物馆, 1994: 149-170.
- [18] 王勇, 上原昭一.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19] 熊海堂. 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20] 贺云翱, 干有成. 考古学视野下的宁波越窑青瓷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J]. 海交史研究, 2020(3): 92-101.
HE Y A, GAN Y C.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2020(3): 92-101.
- [21] 龟井明德, 王竞香. 日本古代史料中"秘色"青瓷的记载与实例[J]. 文博, 1995(6): 112-117.
KAMEI M, WANG J X. Relics and Museology, 1995(6): 112-117.
- [22] 关涛, 王玉新. 日本陶瓷史[M].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 [23] 李刚. "秘色瓷"探秘[J]. 文博, 1995(6): 63-67.
LI G. Relics and Museology, 1995(6): 63-67.
- [24] 郭富纯, 孙传波. 日本古陶瓷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25] 陈雨前, 郑乃章, 李兴华. 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 [26] 林士民. 越窑瓷器装饰艺术之研究[J]. 东南文化, 2000(5): 68-76.
LIN S M. Southeast Culture, 2000(5): 68-76.
- [27] 三上次男, 贾玉芹. 从陶磁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J]. 社会科学战线, 1980, (1): 219-223.
MIKAMI T, JIA Y Q. Social Science Front, 1980(1): 219-223.
- [28] 张文江. 中国古陶瓷对日本的影响[J]. 南方文物, 1995(3): 74-77.
ZHANG W 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1995(3): 74-77.
- [29]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30] 郭云泽. 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J]. 科学社会主义, 2023(1): 99-108.
GUO Y Z. Scientific Socialism, 2023(1): 99-108.
- [31] 刘新成. 文明互动: 从文明史到全球史[J]. 历史研究, 2013(1): 4-10.
LIU X C. Historical Research, 2013(1): 4-10.

(编辑 梁华银)